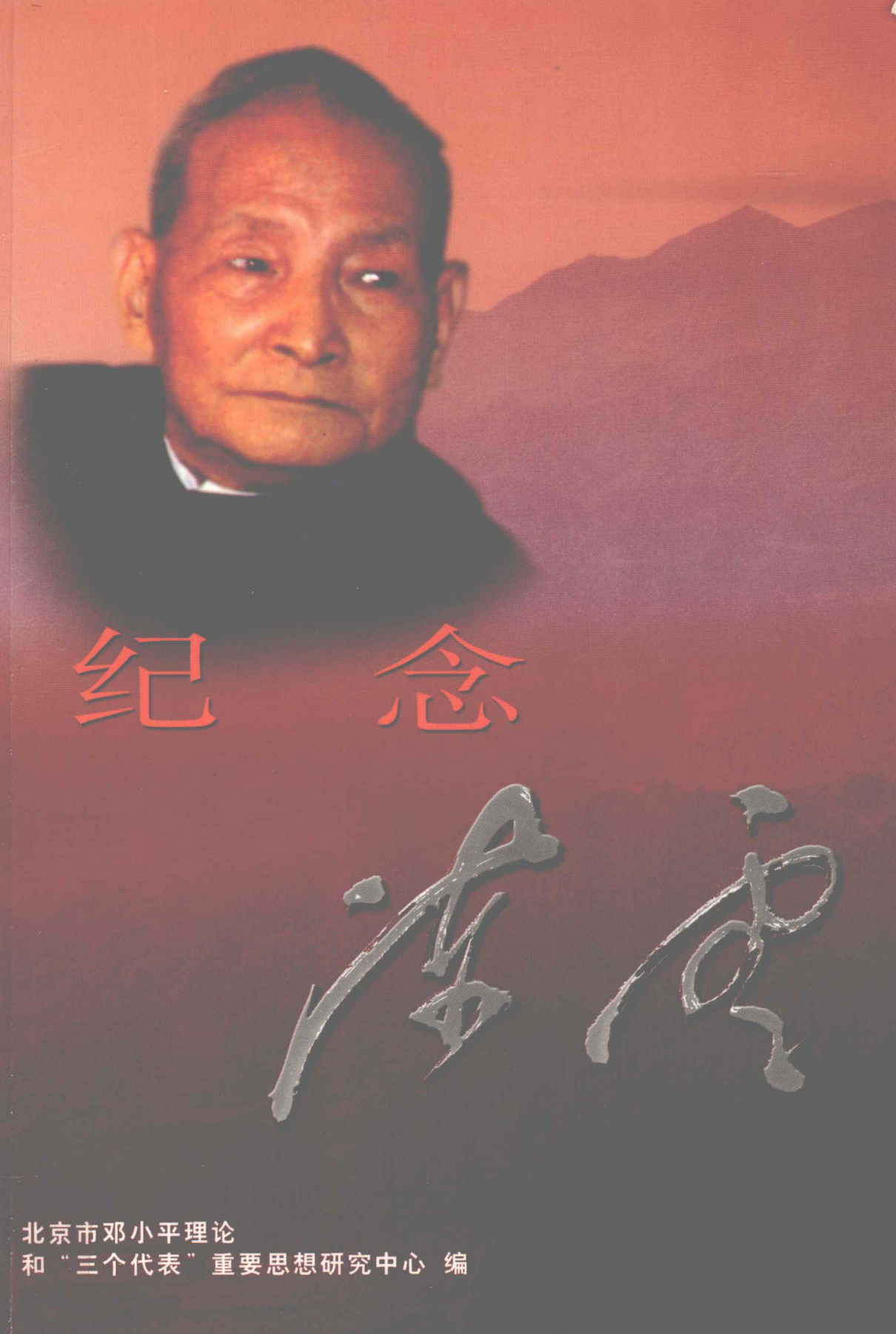




纪 念

邓小平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纪念陈云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陈云/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5

ISBN 7-5051-1225-2

I. 纪…

II. 北…

III. 陈云(1905~1995)—纪念文集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101 号

纪 念 陈 云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责任编辑:肖景华 装帧设计:孙翠之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bbs@publica. bj. cninfo. net

编辑部:84049774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2005年5月北京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4 字数:480千字

ISBN 7-5051-1225-2

定价:48.00元

编者的话

2005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陈云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丰功伟绩,研究陈云同志生平思想,推动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纵深方向发展,促进首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征文活动。在这次活动中,首都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基层工作者积极响应,踊跃参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陈云生平和思想进行了探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对收到的征文进行了认真评审,从中选出45篇优秀论文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论文集的策划和编辑工作,是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领导宋贵伦、张文启等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论文的评选和论文集的编辑,得到了鲁振祥、朱峻峰、迟爱萍等有关专家的指导和帮助;陈建文、辛国安、杜淑华、卢颖华、许星、刘永华、林杨等同志在组织征文活动和论文集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编辑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编 者

2005年6月

目 录

陈云——富于创见的开拓者·····	熊亮华(1)
陈云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	李久林(15)
论陈云关于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	赵存生 宇文利(23)
新时期陈云关于执政党党风建设论述及其启示·····	杨德山 吴玉林(31)
陈云执政党风思想的历史发展·····	石国亮(38)
试论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思想·····	诸素丽(47)
陈云“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的思想·····	吴桂芳(52)
恩德比山岳 仁爱共长天 ——试述陈云对“民生”的牵挂与关切·····	郑建群(59)
准确把握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思想·····	卫兴华(65)
陈云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及意义·····	赵士刚(75)
试论陈云在建国前后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贡献·····	陈争平 郑雅琦(85)
陈云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两点重要贡献·····	何绍铭(95)
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初探·····	李启英(102)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新解·····	刘 瑞 周 达 孙国梁(111)
陈云的“三农”思想及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刘丹萍(121)
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评述陈云“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	梁 营(127)
重温陈云重视粮食生产的思想新得·····	魏 巍(134)
建国初期到八大前后陈云对非公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	郭晓燕(146)
比较 选择 思考 ——建国初期陈云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重要探索·····	丁 青(156)
论陈云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马继胜(165)
陈云一以贯之的思想行为风范——求真务实·····	孙国梁(173)
学习陈云的思想方法和领导风格·····	徐鸿武(180)
学习陈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思想·····	靳连芳(188)

学习陈云的品格风范·····	侯 静(195)
略论陈云的“唯实”哲学·····	严燕子(200)
论陈云的哲学情结·····	林建公(208)
陈云论党内民主·····	梁 柱(216)
陈云关于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金 钊(226)
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	
——学习陈云关于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	左宪民(238)
论陈云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魏 号(245)
试论陈云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徐艳华(254)
陈云与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吴美华 操中斌(263)
论陈云的党员教育思想·····	李志英(271)
陈云关于团结非党干部思想·····	刘冀瑗(277)
陈云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	赵 晖(285)
陈云同志文化思想浅论·····	孙高杰(295)
陈云与上海区域文化·····	瞿宛林(302)
适应青年 提高青年	
——陈云关于评弹艺术思想对高校传统艺术教育的启示·····	汤旭梅(310)
在革命战争时期陈云对我军建设的重大贡献·····	于化庭(318)
陈云与四保临江之战	
——浅论陈云的军事思想·····	程秀龙(326)
陈云创建北满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和工作方针·····	石 勇(334)
从“新兵营”看陈云在领导和工作方法上	
的贡献·····	北京市委讲师团研究室(343)
陈云领导接收沈阳工作的重要贡献·····	孟 蕾(351)
论陈云的党史观·····	王炳林 艾洪庆(358)
陈云与北京工作·····	朱 峰 宋传信(365)

陈云——富于创见的开拓者

熊亮华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多次身负重任,开创工作新局面。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他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寻找到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次次写下神来之笔。

战争年代负责开创苏区工运、组织工作、东北根据地建设新局面时,突出强调“不唯上、不唯书”,自主探索,注重“唯实”

一、负责苏区工会工作,着眼于发展经济,推动工人运动克服“左”倾错误,走上符合苏区情况和中国实际的轨道

1933年1月,陈云到中央苏区后提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长。当时苏区工人运动很多做法照搬了苏联的劳动法,而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小规模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的落后经济状况,甚至把在白区开展政治罢工的一套搬到苏区,使不少企业、作坊倒闭,工人失业。

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4月发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指出:在苏区提出过高经济要求,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工作制,强迫介绍,到处举行总同盟罢工等,是“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他提出,必须向工人群众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①并要求停止那种不发动群众、自上而下规定合同内容的做法,根据不同企业具体情况、自下而上地讨论重订劳动合同。他亲自到福建汀州指导京果业签订符合苏区实际的劳动合同,取得了第一手的经验,并以此为案例,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以实际推动苏区工人运动走上正确轨道。10月,苏区重新颁布《劳动法》,修改了脱离苏区实际的过高经济要求的条文。

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就干部政策、党群关系等多方探索,使组织工作适应抗战后党的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1937年11月,陈云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敏锐地注意到党的组织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机遇。他指出:“现在时代变更了,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二八年有何不同?卢沟桥事变以前与卢沟桥事变以后有何不同?我说今天许多人归向共产

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②为了使党的组织工作适应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开创抗战后组织工作新局面,陈云做了大量工作,突出的是干部政策和根据地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两个方面。

在干部政策上,陈云指出:“天下很大,现在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开展,新的根据地在不断建立,军队在不断扩大,党在全国需要用很多干部,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③但是,内战时期王明路线在干部政策上表现出宗派主义,自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搬用外国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党外进步人士实行“关门主义”,严重破坏了党的干部工作。不消除干部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就会严重影响党的组织大发展工作。1938年9月,陈云作《论干部政策》的讲演,提出了12字干部方针:“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④在强调党的干部政策转变时,同样强调干部遵守党纪的要求,组织部门对干部的审查是严格的,理想、纪律教育是认真的。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组织部,办成了“干部之家”。各级党组织在培养、选拔、审查和使用干部时,贯彻干部政策的新方针,适应了抗战开始后党的事业大发展局面的需要。到党的七大时,干部队伍由抗战初的3万发展到40万,党员人数相应由4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左右。实践证明陈云的探索效果是很好的。

抗战以后,党的发展由过去自下而上在群众斗争中发展,变为在抗日根据地执政条件下,通过军队和政权自上而下地大量发展,党群关系面临新的挑战。陈云分析了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新特点。一方面,群众对党员和党组织要求更高。“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则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员的要求越多越严。”^⑤另一方面,党群关系处理不好将直接损害群众利益。“我们要向群众要东西,如果不要,就没有饭吃。但是,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⑥陈云特别着重指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⑦因此,陈云主张,党在根据地执政条件下,必须在党群关系上对党员和党组织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党员应该是“群众模范”,“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⑧在调查研究后他感到,“我们的群众工作确是最薄弱的一环”^⑨。为此,陈云提出:“要使抗战前进一步,要使我们党的工作前进一步,问题的根本,在于开展群众工作。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⑩在经过建立军队、大规模建党两个阶段自上而下地组织群众后,第三阶段就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把区委和支部的注意力引向讨论和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引向当地的群众工作,是今天重要的任务。”^⑪为深入群众工作,11月1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陈云在延安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群关系的探索,为巩固党的组织、密切党群关系,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主持西北财经工作,探索财政与金融贸易、边币与法币关系,找到了解决边区金融动荡的“金钥匙”

1944年初,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由于在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不多,在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1943年边区金融物价却发生很大波动,引起干部群众很大的不满。

金融物价波动的根源在于一些干部过于强调战时财政的供给职能,导致货币发行过量。1943年5月,边区银行划归财政局管理,商业性质的光华商店划归物资局领导,使银行成了财政的出纳,物资局实际是供给部,财政予取予求失去控制。陈云打破财经工作中的单纯供给观点,立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全局,认为:“财政与金融、贸易的关系,基本上是金融、贸易为了财政,这是大政方针。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②陈云指导西北财经办事处确立了边区银行的商业性质,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严格财政收支管理,解决了边币发行失控这一根本性问题。同时,他采取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夺回被法币侵占的流通市场,强化对国统区贸易的统制,加大金融贸易对边区工农业生产的支持等措施,彻底扭转了边区金融物价的被动局面。

四、不为先机占领大城市的表象迷惑,力主把主要力量放到在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

1945年9月,抗战刚结束,陈云就受命赴东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北满分局和南满分局书记等职,参加领导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党的根据地过去都是靠深入的群众工作和艰苦的武装斗争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但进入东北之初,有的干部以为凭着先入东北的优势和苏联的支持,可以通过谈判独占东北。干部滞留大中城市,主力部队集中于南线力图拒敌于东北之外,而广大乡村投入力量非常薄弱。陈云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坚持把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当作立足之本。他对东北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指出苏联会援助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满洲发展,但也要执行中苏协定,把东北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交给国民党。国民党正集结力量争夺东北。陈云认为,“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③

1945年11月29日、30日,陈云同高岗、张闻天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不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只需

集中必要武装力量在前线尽可能阻击敌人,目的是争取时间,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⑭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东北局在遭受较大挫折后意见逐渐一致,并于1946年7月通过了陈云起草的七七决议。陈云致力于北满根据地建设,为四平保卫战后北撤的东北局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为东北全境在全国率先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国情和经验出发,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 建设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创者和奠基人

陈云在全国解放前夕,于1949年5月由东北回中央,开始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强调要从中国实践中找寻经济工作的规律。从东北入关前,有人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安下地盘试一试”。1957年1月,他在谈到有关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时,又明确说:“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⑮1980年1月25日,他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讲到建国后这段时期的探索时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⑯

一、面对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波动,陈云并不急于从金融上着手,而是先与投机资本争夺市场主导权,在军事胜利后“一统一调,天下大定”,为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创造条件

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陈云接手的是一副经济上的烂摊子,百废待兴。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长期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所造成的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1949年初到1950年初不到1年时间,投机资本就掀起4次物价波动,人心惶惶。“不改变这种坏情况,我们就不可能稳定经济和市场秩序,并使社会的生产和流通沿着正当的轨道前进。这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⑰

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而财政经济困难,军政费用很大部分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解决,通货膨胀一时难以遏止。投机资本制造市场混乱和恐慌,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

战后各国对付通货膨胀,基本有两类做法。一类是苏联战后对付通货膨胀,用的是行政强制手段,就是货币改革之机,按阶级成分确定不同兑换率,实际上是变相没收存款。联邦德国则是“休克疗法”,突然放开物价,求得市场供需平衡,但这

种所谓“来自市场的繁荣”是以美国的强大支持为后盾的。陈云并没有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单纯从金融上打主意,而是在借鉴东北时期的一些经验,结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掌握重要物资,取得市场主导权的基础上,允许物价随通货膨胀水平适度平稳上涨,防止暴涨。

陈云提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⑬因此,他不主张减少军政开支来解决困难,而必须适度增发,保证军费和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必要支出,为此不惜忍受物价继续合理上涨。1949年8月他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就提出,“为了保证今年秋季的支出,8至10月每月需发行1633亿元人民币,以7月底2800亿元为基数,每月发行指数增加58%。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则物价也将上涨58%。”^⑭另一方面,应通过发行公债、抓紧征收公粮、整顿税收、精简节约、调剂物资等措施,尽可能增收节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要稳定物价。陈云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配合,坚决打击投机资本,先掌握住市场主导权。特别是在10月15日开始的第三次物价风波中,陈云在稳定物价的时机选择上,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11月13日,他在部署统一行动的指示中,经周密计算,判断到11月中旬物价随通货膨胀水平应有2倍的合理上涨,在此基础上才能稳定物价。陈云指出:“半月前希望把物价稳定在九月底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10月初至今天为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两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⑮他指挥财经部门以沪、京、津、汉等主要城市为阵地,机动灵活地调度粮食、纱布等市场主要物资,在11月25日开始统一抛售,同时通过停放并催收贷款、开征新税、暂停支付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举办折实贷款、宣布发行公债等办法收缩银根,一举稳定物价,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毁灭性打击。1950年3月,在除西藏外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的情况下,陈云领导财经部门迅速统一全国财经,实现收支平衡,消除通货膨胀。随后通过调整工商业,扭转商品滞销状况,实现了市场的繁荣稳定,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创造了条件。

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中,妥善安排各种经济成分,平稳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为完善体制作了创造性思考

新中国经济建设是伴随着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而展开的。苏联在经济转型中,出现过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了对民族工商业“限制、利用、改造”政策,但在现实中千变万化的情况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如何贯彻,确保大规模经济改组顺利实现,是陈云面临的严峻考验。

战胜投机资本、消除通货膨胀后,有一种意见主张乘胜追击,搞掉私人资本。一些苏联专家也对中国让给私人工商业一些营利空间感到不理解。陈云否定了这

种意见,主持调整工商业,提出处理公私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捣乱的人们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②从这个基本点出发,1951年7月,他提出关于经济改组的3条对策:“一是欢迎发展。我们欢迎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二是指导转业。转业问题中有劳动力的转业及资金的转移。”“三是加强领导。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②

按照这样的对策,陈云先后成功领导了1950年和1952年两次工商业调整,并使民族工商业在有利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国营经济的极大加强和经济改组的逐步深入,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陈云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使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生活仍能基本保持平稳。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以后,陈云又开始考虑进一步完善。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以建成“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计划经济还被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时候,陈云就设想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保持多种经济成分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可能性,提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它(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③

三、受命解决大规模建设开始后粮食供求矛盾尖锐化的问题,提出农业支援工业化的方法——统购统销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搞工业化,必然要求农业作出巨大贡献。苏联搞义务交售制,把农民卡得很苦,使得农业长期徘徊不前。中国工业化中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随着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在1953年以粮食供求矛盾尖锐化的形势,摆在陈云面前。陈云建议实行统购统销,即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并调整中央和地方在粮食问题上的内部关系。这样,既保证国家切实掌握必要的粮食,同时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他认为“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④

陈云考虑征购,并不是单纯只考虑国家的需要。他认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⑤实行征购后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必然影响生产积极性。陈云考虑了这一点,提出:“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⑥陈云对征购的数量、价格,以及供应农村的物资,都作了缜密的安排。

陈云认为征购的数量和价格是决定性的因素,他的考虑是:“两年来,农民实际拿出来的粮食,每年都在六百亿斤以上,我们现在要征购的是三百四十亿斤,从数量上说,完全有可能实现……农民每年拿出的六百多亿斤粮食中,有四分之一左右要回到农村,主要是经济作物区和灾区。实际上这部分粮食起了调剂的作用。”“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⑦1955年,陈云经过调查,又建议实行定产、订购、定销,进一步完善了征购制度。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后,稳定了粮食市场,保证了国家需要和城乡供应,保障了农民的合理利益,促进粮食生产。据典型调查,1955年同1950年比较,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约缩小1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55年70元增至1955年82元^⑧。但是,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经济上长期“左”的错误影响,统购统销政策长期未能调整,反而日益强化。这样虽然基本保证了国家的需要,但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这是违背陈云设计这一政策的初衷的。

四、主持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的经验都表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平衡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陈云在主持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时,没有机械地搬用原理,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深入探索。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一五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⑨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必须实行超常规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下,应如何保持平衡呢?在陈云看来,这种平衡是紧平衡,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消极的平衡,而是积极的平衡。他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⑩

但党内对紧平衡下的快速增长仍不满足,主张打破平衡,进一步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发展速度。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从1955年第4季度开始,经济建设出现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下半年开始,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领导了反冒进。根据正反面的经验教训,1957年1月,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发言中,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

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他提出防范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危险的方法:“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但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④一五期间,国民经济总的来看,实现了比例平衡下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新时期,一再强调不能囿于已有经验, 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中全会后,陈云重回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经验丰富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却特别强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再表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⑤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求实探索的勇气,在经济调整、改革开放、党风建设、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等方面,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面对“左”倾错误干扰下饱经折腾的国民经济,及时提出并主持调整,力主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

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财经工作。新时期的经济工作首先要克服长期“左”倾错误和政治动乱给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并解决前两年急于求成的“洋跃进”造成建设规模过大、比例失调的问题。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提出大量进口粮食稳定农民、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生产和基建不留缺口等重要建议。1979年3月他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明确建议:“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并针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⑥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调整中,陈云还亲自对影响全局的“宝钢”建设问题调查研究,作出了“分两期、干到底”的决策。并且提出,从国家财力物力来看,今后建设像宝钢等大型工程,“六五”和“七

五”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④党的十二大确定20年翻两番战略目标，同时确定在步骤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陈云极为支持，指出：“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么，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⑤由于采取了稳妥的步骤，新时期以来国民经济既实现了高速增长，又避免了急于求成的大折腾。

二、改革开放思想准备和实际经验不足，陈云较早探索加强市场作用的改革，推动开放稳步进行

陈云50年代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刚建立时，就探索过改革问题，但未能落实。随着党内“左”的思想一步步发展，经济体制也日益僵化，单一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更加突出。陈云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⑥

在早年思考的基础上，陈云总结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教训，深入思考了改革问题，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⑦

当然，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一过程中完善计划工作和国家宏观管理十分必要。1982年12月，陈云针对搞活经济中出现的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特别指出：“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⑧

陈云的思考有力地推动了改革进程。二中全会以后，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摸索，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反映了认识随着实践而逐步深入的过程。

陈云也是党内最早注意到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工作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五十年代，陈云成功地领导制订和实施一五计划，利用苏联援助加速工业化进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时，他又敏锐地指出：外贸工作“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⑨

粉碎“四人帮”以后,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方针,陈云认为这是正确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陈云提出:“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④但那时对利用外资存在着一种过热的情绪,陈云及时提醒大家引进外资时要头脑清醒,不要忘记资本追求平均利润率的本质;利用外资要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配套能力,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办特区要注意总结经验,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多,等等。陈云的支持和提醒,对于对外开放的平稳起步和逐步深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敏锐地抓住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提出“党风问题是有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的风气。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党风问题强调的重点是民主集中制。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日益严重,但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和重视,有人甚至不同意“不正之风”的提法。

陈云认真分析了执政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新特点,把党风问题强调的重点转移到以权谋私等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上,并于1980年11月,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⑤把党风问题提到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982年,陈云又提出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以利整顿党风。他支持党的纪检部门抵制了要求纪律松绑的错误意见,一再提醒全党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

如果不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紧紧抓住党风问题,党风必然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于陈云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开始就抓住了苗头,估计到了党风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党风和社会风气总体上保持了健康,遏制了以权谋私和经济犯罪迅速泛滥的势头,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地进行。

四、深谋远虑,建言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

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但干部队伍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主要问题:一是“老化”现象严重;二是相当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懂得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更少。

为此,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全力推动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在他们共同努力下,形成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方针。在这项工作遇到很大阻力和一些体制上、观念上的严重束缚,进展不大时,陈云疾呼,“如不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1981年5月,他正式向中央建议:“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

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⑫

中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和他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干部新老交替进度大大加快,为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保持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陈云开拓新局面的特点与启示

陈云开拓新局面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一系列论述和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探索,体现了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善于把握大局,抓住要害

1956年9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⑬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主持苏区工会工作时,他及时认识到,江西苏区工人已经摆脱了政治上的压迫,工人的经济斗争,不在于像白区那样争取更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在于发展经济。担任组织部长后,紧紧抓住抗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的事业面临大发展的机遇的时代特点,解决大发展面临的干部瓶颈和自上而下发展可能脱离群众的问题。初入东北,他在国内国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判断形势,力主将力量投入根据地建设之中。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他全面衡量国营经济实力,确立力争物价平涨而非暴涨的现实可行目标,掌握了市场主导权,从而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稳定了物价,恢复了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领导经济恢复和制订实施一五计划,他都首先从国力出发,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必要的比例关系,在保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在三中全会后的历史大转折关头,他抓住经济调整、确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党风建设、新老合作与交替几个关键环节,综合考虑了拨乱反正与现代化建设、目前需要和长远发展的关系,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成功地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陈云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实践,突出反映了他善于把握大局、抓住要害的高超政治智慧。

二、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的出发点

陈云一到苏区就着手纠正“左”倾错误,就是因为他看到工会工作中脱离群众,搬用教条,结果不但影响工人当前的利益,也影响工人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抗战中主张加强群众工作来巩固党,就是他能够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较早地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在根据地已经处于执政地位,党群关系在过去发动群众阶段“党找群众”的基础上,出现了执政条件下“群众找党”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只知